

中国沿海人口与经济发展

学术讨论会综述

宋瑞来

受中国人口学会委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辽宁省人口学会、大连市人口学会联合主持的“中国沿海人口与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于1990年10月26~29日在大连市举行。

来自中国人口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9个省市社会科学院和大专院校,以及部分省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及一些新闻机构,共26个单位、50余人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26篇。

会议具体工作由辽宁省人口学会会长曹景椿组织。10月26日,辽宁省和大连市部分党政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田雪原教授作了题为《发展经济,促进转变,寻求人口与经济良性循环》的主题发言。

田雪原教授阐明会议的主题是沿海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并强调了该项研究的重要意义。中国人口与经济在各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研究都具有典型意义。与全国相比,沿海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具有某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沿海地区又表现为某种共性。由于沿海地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转变在国内处于领先阶段,对这种共性或共同规律的研究,就解决中国人口问题而言,具有一定的“超前”探索性质。

会议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沿海经济发展与生育率转变的关系

田雪原教授认为,在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两种循环:一种是初级循环,其循环圈为:低生产率→高生育率→低生产率,其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数量;另一种是高级循环,其循环圈为:高生产率→低生育率→高生产率,其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质量。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降低孩子对家庭的养老效益、劳动效益、保险效益等,降低了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促进了孩子成本的构成从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的转变。在沿海部分地区已出现这类事例。然而从整体上看,沿海地区尚处

于初级循环向高级循环转变阶段,依然存在一些刺激家庭增加对孩子数量需求的因素。目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创造适当的外在和内在条件,通过对孩子成本和效益的社会调节,寻求实现人口与经济良性循环的途径。

许改玲副教授认为,我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传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的传统的生育文化意识根深蒂固。首先,就经济与家庭生育意愿的关系而言,经济发展与生育意愿转变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但这种互动所引起的变化是微小的、渐进的,其变化过程为:控制生育→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生育意识变化→促进控制生育。这种生育意愿转变具有艰巨性、复杂性、灵敏性等特征;其次,我国现实社会经济水平与生育意愿转化的综合临界点差距较大。生育意愿转变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外经验表明,生育意愿转变有了非单项的、综合性的临界点。它包括婴儿死亡率在15%以下,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73岁以上,城市人口比重在73%以上等10余个社会经济指标。而我国除1项指标外,其它指标都与临界点有很大差距。我国计划生育的成绩主要建立在超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第三,这种状况决定了目前的生育控制仍以国家积极干预为主,但从长远看,生育意愿转变的中心工作要转变到对人口素质需求的调节方面。许改玲认为,人口需求运行机制是决定人口再生产运行机制的关键,传统人口需求运行机制不改变,人口数量、质量的供给机制就不能从根本上转变。所以,实现转变的根本途径是逐步建立提高人口素质的需求体制。

宋杰副教授强调要注意沿海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对家庭生育转变的影响。沿海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发展,刺激家庭对孩子需求的上升。同时要注意生育观相对独立性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部分同志认为,对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家庭生育行为之间的

关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快,大部分属于传统工业,它改善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了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预期收益。

多数与会代表赞同沿海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循环向高级循环的转变阶段,并认为生育控制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但目前经济发展对生育率变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在大中城市及部分发达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促进了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但沿海地区的部分小城镇和大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较多的刺激生育率回升的因素。

二、沿海经济发展与人口的流动、迁移

沿海地区近1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诱发了国内人口持续、大规模地向沿海地区的流动和迁移。对此,各省市提供的论文都有所反映,也引起与会代表的普遍关注。

徐天琪副教授与李婷讲师,在不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概括了沿海地区流动、迁移人口的一些重要特征。首先是流动人口数量大,覆盖面广。这种流动、迁移浪潮不仅出现于沿海城镇和第二、三产业,也波及沿海农村及第一产业;其次为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轻,文化素质高,以男性为主体,同时年轻女性流动人口也呈持续增长趋势;第三是流出地广泛,但以内地和边远地区为主。不少少数民族也卷入向沿海的流动、迁移,甚至包括个别东南亚国家的公民;第四,呈梯度流动态势,且流动途径、流动目的多元化。

与会代表还就沿海地区流动、迁移人口日趋增长的原因和利弊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并在下列观点上达成共识:

就流动、迁移原因而言,第一,大家认为这是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第二,尽管这种流动受“推”、“拉”两方面作用力的支配,但以沿海地区的“拉”力为主。一方面沿海地区各产业的生产率高,人均收入高;另一方面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快,就业环境相对宽松。

就流动、迁移人口增加所产生的利弊而言,多数代表认为利大于弊,但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不容忽视,迫切需要有关部门综合治理。这些问题包括:

第一,对流出地而言,常常是“人才”“大脑”外流,这不利于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宋杰指出,黑龙江省自1980年以来,每年平均净迁出8万人,以文化素质高者居多;

第二,农村日益增加的、以婚嫁为直接目的的女性人口跨省迁移,导致流出地性别比失调;

第三,对沿海城镇的基础设施增加了压力,而流入地管理手段未跟上,产生了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超生、拐卖人口、重婚及一些社会治安问题。妇联、公安、计划生育部门对此很有意见;

第四,我国人口的地理分布历来不平衡,人口持续向沿海地区流动、迁移,将加剧这种不平衡,如何使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全国人口布局的基本战略相协调,已成为应予以重视的研究课题。

三、沿海经济发展与人口城市化

辽宁、浙江、河北等省不少人口研究机构的专家,探讨了沿海地区人口城市化的特征、趋向及存在的问题。认为沿海地区人口城市化有下列特征:

第一,沿海地区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普遍高于内地;第二,人口城市化的直接原因已发生重大变化。韩常林、刘责平指出,1980年前后,直接动因是招生、招工,落实政策,解决随军家属。而目前的直接动因主要是招生、征用土地、解决科技干部和职工家庭问题。姜红指出,自1978年以后,城市人口增长已从自然增长为主转为机械增长为主;第三,开放地区的大城市及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在继续扩大。刘长新、刘燕南指出,辽东半岛对外经济开放区人口迁移变动的一大特点是城市人口呈净迁入状态,县(市)区人口呈净迁出状态。薛军指出,1985年以来河北省城市规模分布中集中化倾向不断增强。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目前的投资机制及外资和中央投资的方向,必然导致沿海地区大城市及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

与会代表认为,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决定了今后沿海地区人口城市化仍将快于内地的发展速度。处于开放地区的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仍将以机械增长为主的形式增加。

与会代表还十分关注沿海地区大中城市的发展规模与发展方向。我国城市布局历来存在沿海过于集中的问题,目前变化趋势的宏观社会、经济效应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其它有关问题

会议还探讨了人口素质、粮食、生态环境与沿海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广西北海、黑龙江黑河、辽宁省大连市等区域性开放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康清,芮政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

(下转第33页)

口出生状况的一致性很好,内部方差较小。但是,在辽宁、新疆等省、自治区,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生活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即使同样是农村,平原地区和山区差距也很大。此外,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程度也不尽相同,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本身也并非一致。因此,省内各地区的出生率差异较大。为了在同样的可信度下,得到出生率估计的相同精确度,那些省或自治区的样本数应该比上海大得多。

当然,式(10)用于计算省级样本量的不合理性主要是在于它的前半部分,它是在简单随机抽样背景下,当CBR是一种比例时,用来确定省级样本量的。比如 $CBR = Y/N$,这里 N 是一个确定数,只有 Y 需给以估计。但现在 $CBR = Y/X$ 是一种比率,是两个估计量之比,分子与分母均需从抽样调查中估计。因此,从理论上讲,由式(10)出发来估计省级样本量是欠妥的。并且在实际使用中,不区别各省具体情况,一律取设计效率为1.4,必然得出样本数与各省人口出生率估计量的方差毫无关系的结论。这当然令人难以接受。

为了能得到较为合理的省级样本数,方法之一是提高更加妥当的省级样本量计算公式(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方法之二是,如果利用公式(10)作为一种近似计算,那么根据各省的具体情况,应使用不同的设计效率。按照科克伦在《抽样技术》中的论述,设计效率应为①

$$deff = \frac{\text{复杂抽样方案所得样本的出生率估计量方差}}{\text{相同样本量的简单随机样本的出生率估计量方差}}$$

式中的分子部分为公式(4)的计算结果,分母部分则为:

$$V_{RAX}(R) = \frac{N-n}{Nn \cdot \bar{x}^2} \cdot \frac{\sum_{i=1}^n (y_i - R\bar{x}_i)^2}{n-1}$$

这里的 N 是全省的最后一级抽样单元数,即村民小组数, n 是抽中的村民小组数, y_i 是第 i 个村民小组在1989年的出生人数, x_i 是第 i 个村民小组在1989年的年均人数, $\bar{x} = \frac{1}{n} \cdot \sum_{i=1}^n x_i$, R 为该省样本按简单

随机抽样原则下的人口出生率估计,即

$$R = \frac{\sum_{i=1}^n y_i}{\sum_{i=1}^n x_i} \quad (13)$$

对一个省来讲,近一二年的生育状况变化相对较小,从而可以充分利用1989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得到的资料,来估计每个省人口出生率的设计效率。这对第二年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中省级样本量的确定有重要作用。(本文责任编辑:洪映)

(作者工作单位:周祖根 上海市人口普查办公室、梁小筠 华东师范大学数理统计系)

① 参阅W·G·科克伦:《抽样技术》4.11和6.3节,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4月。

(上接第64页)

所部分同志认为:沿海地区的人口素质是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专题调查的资料表明,沿海地区的人口素质普遍高于内地,但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技师和技工不足,普通工人比例过大。这种技术断层将降低沿海地区对国外资金、技术的吸收能力,也将拖延新技术的传播周期。此外,分配体制和用人体制恶化了人力资本的投资环境,造成对人才、技能的需求“疲软”。人不能尽其才,物必不能尽其用,扭曲的体制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降低了沿海经济的发展速度。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到大连对外经济开发区进行了考察,金州区大魏家乡后石村的阎克振同志介绍了该村人口与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经验。

最后由田雪原教授作了会议总结,他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第一,会议开的适时,沿海人口与经济

方面存在的值得研究的问题正在暴露出来,太早太晚都难以处理。第二,会议开出了特色,突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绝大多数论文都在调研的基础上写成,参加会议的有理论工作者也有实际工作者。第三,会议交流了成果,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田雪原教授在总结中还概括了沿海人口与经济变化呈现的7个趋势,即:(1)伴随经济起飞,沿海人口数量继续增长的趋势;(2)人口自然增长的双向变动趋势;(3)人口向沿海迁移迅速增加的趋势;(4)城市人口加速增长的趋势;(5)生产年龄人口增长和就业结构转型发展趋势;(6)经济技术进步和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趋势;(7)人口加速老龄化趋势。

与会代表认为这次会议很有收获,并希望中国人口学会能组织力量,对有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本文责任编辑:汪正鸣)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